

乡村春晚活动在农村基层党群关系构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谭啸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春晚作为一种扎根基层、贴近民众的文化活动，不仅承载着乡土文化的传承功能，更逐渐成为党群关系互动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乡村春晚活动的组织实践，深入分析其在促进农村基层党群关系构建、推动村民自治、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培育新乡贤文化以及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乡村春晚以其群众性、自治性和文化性为核心特征，不仅能够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还能有效促进党群互动，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探讨，本文提出应将乡村春晚纳入乡村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以文化为纽带、以群众为主体、以党群为核心的多元治理模式，从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提供新的路径和经验。

关键词：乡村春晚；基层党群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春晚起源于农民自发组织的节庆文艺活动，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它逐渐从一种民俗性娱乐活动演变为凝聚人心、促进共治的重要文化平台。当前，农村社会的发展呈现出经济结构多元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和文化需求多样化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群关系的构建不仅仅局限于经济与政治领域，更需要借助文化载体来实现价值共鸣和情感认同。乡村春晚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治理方式，能够通过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形式，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强化党群之间的信任纽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本文将乡村春晚为切入点，从党群关系构建、心理服务体系融入、文化路径选择及新乡贤文化培育等方面展开分析，全面揭示乡村春晚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独特功能与价值。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文化活动与治理体系的有机融合路径，阐释乡村春晚如何在实现文化传承的同时助力党群互动，最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农村基层党群关系的构建与乡村春晚的作用

（一）经济发展与党群关系塑造

经济发展始终是党群关系稳固的核心支点，也是衡量农村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在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经济诉求日益多元化，既包括收入水平的提升，也涵盖就业机会、产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全面改善。乡村春晚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虽表面上以娱乐

乐为主要特征，但实则蕴含着经济发展与党群关系互动的深层逻辑。

每逢春晚筹办，往往需要舞台搭建、灯光音响、服装道具等投入，这为当地工匠、商户和服务业带来了短期收益。与此同时，春晚节目中通过展示地方特产、农副产品、非遗手工艺等形式，不仅满足了农民的文化自豪感，也成为产业推介的重要平台。例如浙江丽水在举办乡村春晚时，就专门设置农产品展示环节，带动了山茶油、笋干、香菇等农特产品的销售，甚至通过网络直播将乡村年货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文化活动由此转化为促进消费、带动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随着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发展，春晚作为文化符号和节庆品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村落在表演中融入非遗文化、民俗表演和地方节庆活动，提升了旅游吸引力，进而推动农家乐、民宿经济的发展。对于党群关系而言，这种经济收益不仅让农民切实受益，也让群众深切感受到党组织带领下集体发展的成果，增强了信任感与归属感。党组织通过这一平台可以更直接了解农民的经济困难和发展诉求。例如，在春晚期间，村委会或党支部常借机宣讲惠农政策，如产业扶持、创业贷款、教育补贴等，使政策宣传从“纸面”走向“舞台”。这种方式既提升了农民的政策获得感，也促进了党群之间的沟通交流，使经济发展与党群关系的良性循环得以实现。

基金项目：浙江音乐学院 2022年度音乐学研究所开放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春晚”到“村晚”的转型与跨越》（项目编号：ZY2022M007）

（二）民主建设与制度保障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农民在基层公共事务中的广泛参与。乡村春晚不仅是一场文化演出，更是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实践，其背后体现的是民主建设的深入推进。

乡村春晚的节目多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完成，从主题选择到演员招募、排练筹备都需要村民集体商议。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参与式治理”，它打破了过去村民仅作为被动接受者的局面，使他们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在这一过程中，村民不仅表达了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也锻炼了组织协调、民主协商的能力。以往基层治理容易出现“上情难下达、下情难上达”的困境，而乡村春晚恰好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交流空间。党组织在春晚中既是支持者也是监督者，可以通过公开流程、公开决策的方式确保活动资金、节目审核等方面的透明性。村民在监督过程中增强了民主意识，对治理体系的信任度也随之提高。许多地方在春晚间隙穿插政策宣讲、小品演绎甚至互动问答，使农民在轻松氛围中掌握政策要点。这种创新形式避免了单调的会议式宣讲，使民主参与更具吸引力和接受度。通过这种方式，制度化治理不仅嵌入文化活动，更转化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三）组织建设与思想引领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乡村春晚为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引领提供了绝佳载体。传统的思想教育多依赖会议、文件或集中宣讲，形式相对单一。春晚通过小品、歌曲、舞蹈等生动形式，将廉政文化、家风教育、乡村振兴理念融入其中，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农民在欢笑与共鸣中接受思想熏陶，增强了对党组织的认同感。许多乡村春晚中，党员干部主动登台参与演出，与村民并肩合作，打破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这种平等、亲和的互动方式，不仅提升了党组织的形象，也增强了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党组织通过这一平台倾听民意，及时发现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并在活动后转化为治理举措。比如，有的乡村在春晚中收集群众意见，并在会后形成整改清单，推动公共服务改进。这种从“舞台”走向“制度”的路径，展现了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中的灵活性和实效性。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心理服务体系构建

（一）心理服务的缺位与需求

长期以来，乡村治理更注重经济建设与制度完善，忽视了农民的心理健康与情感需求。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与城乡差距缩小，农村居民的心理问题逐渐显现。

留守儿童的孤独感、空巢老人的孤立感、外出务工人员疏离感，构成了乡村社会的重要心理困境。若不能在治理中纳入心理服务，治理现代化将不可避免地失衡。

（二）乡村春晚的心理疏导功能

乡村春晚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化展示，更体现在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上。乡村春晚作为一年一度的集体盛会，带有浓厚的仪式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满足村民的情感归属需求。在欢声笑语中，农民可以释放日常积累的紧张与焦虑，重建积极心态。外出务工人员通过直播、短视频参与春晚，与家乡建立精神联结，有效消解离散感。因此，乡村春晚不仅是一场娱乐表演，更是一种群体心理疗愈的文化机制。

（三）多元主体协同的心理服务模式

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多元主体协作。党委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发挥主导作用，社会组织和专业心理团队提供支持，村民自组织群体负责实际运行。在乡村春晚中，这种协同模式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政府部门可通过资金与政策保障为春晚提供支持；社会组织和高校团队则可通过心理剧、辅导工作坊等形式嵌入春晚内容；村民自组织群体则在排练与表演中自我调适，形成“文化化”“社区化”的心理服务路径。这种模式实现了心理服务的本土化与大众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三、乡村春晚在治理实践中的功能与路径

乡村春晚作为一种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文化实践，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形式，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多维度的功能和路径。其首要价值在于强化农民自组织化与文化自治。春晚的筹备、演出和传播往往依赖于村民的自发参与，他们既是节目的创作者，也是活动的组织者和消费者。在共同策划和排练的过程中，村民通过集体合作逐渐培养了协商精神和自治意识，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文化自治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他们的治理参与能力，使村民在实践中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从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

与此同时，乡村春晚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多样化路径。在表演内容和形式上，它既传承了乡土文化基因，又不断创新表达方式，使传统戏曲、民俗技艺和非遗项目在当代得以延续与再生。不同地区还结合本土实际打造差异化的春晚品牌，例如景宁的“百村闹春”、云和的“百项非遗”、松阳的古村落春晚等，形成了“一村一品、一县一特色”的文化格局，既体现了地

域文化的独特性,又丰富了乡村文化的整体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春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强化了村民的主体地位,他们不仅通过舞台表达乡愁和情感,更在文化再生产中建立了自信和认同,这种以农民为核心的文化实践有效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此外,春晚还为新乡贤文化的培育提供了契机,那些德高望重、具有号召力的村民往往在活动中承担组织和引领角色,他们不仅推动了文化传承,更以身作则引领乡村治理风尚,进而促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乡村春晚推动了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形成。在活动组织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与村民三方形成了互动机制:政府通过政策与资金支持提供制度保障,社会组织凭借专业优势提供技术指导与文化资源,而村民则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参与和反馈。三方的协同不仅确保了活动的顺利开展,更推动了乡村治理由单一主体主导向多元主体合作的转型。乡村春晚所营造的公共文化空间,使治理活动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参与性和包容性,在文化的载体中实现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度融合。通过这种文化化的治理实践,乡村逐渐形成了以文化为纽带、以村民为主体、以党群互动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真正实现了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四、结论

乡村春晚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党群关系构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通过对乡村春晚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第一,增强了党群关系的紧密度,使党组织更好地了解并回应农民需求;第二,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缓解了心理压力,提升了社区凝聚力;第三,

推动了村民的自治实践,激发了治理主体意识;第四,培育了新“乡贤”文化,促进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第五,优化了社区治理结构,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因此,未来乡村治理应进一步重视乡村春晚等文化活动的价值,将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框架,推动文化治理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的深度融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基层的良性互动和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 [1] 朱大梅,陆小黑,胡泽农.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治理的耦合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4,39(4):456-463.
- [2] 张甲冰,李潇,梅琼文,等.地方农业高校大学生助力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调查研究——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为例[J].江西农业,2024(5):149-151.
- [3] 庄伟航,霍雅琴.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理路[J].行政科学论坛,2024,11(2):50-54.
- [4] 李心怡,高春风.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路径[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1):158-161.
- [5] 李宁阳,梅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进路[J].公共治理研究,2024,36(2):73-86.
- [6] 杨帆,杜刚.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时代意蕴[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2):136-141.
- [7] 赵姿君.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思考[J].区域治理,2024(5):0255-0257.
- [8] 陈秀阳.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26(2):21-25.